

与今古文经学

令司馬遷撰

秦始皇本紀第六

桑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呂氏莊襄王者孝文王之中子。昭襄王之孫也。名子楚。按戰國策本名子異。後爲華陽夫人嗣夫人。

趙 質音致國音欲待弱之來相事故遣子及貴臣爲質如上音國弱懼其侵伐令子及

見呂不韋媼悅而取

大賈也其說
獻於子楚

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

生於邯鄲

氏王音政周正建子之年十三歲莊襄王
爲政以始皇諱故音征

死。政代立爲秦王。當是之時。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

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

陈桐生 著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

陈桐生 著

史记与今古文经学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

《史记》与今古文经学

陈桐生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陕教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4 插页 193 千字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419—6197—3/G·5445

(简精装) 定价: 10.60 元

序 言

董继昌

中国有世界文化名人司马迁，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陕西乃司马迁的故里，这更是陕西人民的光荣。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三秦研究司马迁的学者们组织起来，成立了“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开展有计划的群体性研究，这在司马迁研究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先例。研究会成立后，研究工作迅速铺开，仅两年多的时间，大型工程《史记研究集成》已正式动工，大型电视专题片《司马迁万里行》已开机拍摄，大型丛书《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第一集已顺利完成，这亦是史无前例的壮举。对这些可喜的事功，我感到十分欣慰和由衷的高兴！这里仅就即将付梓的《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说几句话。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共 28 本，包罗天、地、人、物系统知识，从史记百科全书这一广阔的领域内揭示出司马迁与中华文化的密切关系。过去，人们通常赞美司马迁是位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或再以“史圣”誉之，这都不足以全面体现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真正的崇高地位。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郭沫若先生曾以“功业追尼父”称颂，认为是孔子之后的另一位文化巨匠，这是一点不假的。事实上，司马迁本

来就是以继承孔子而自许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正是为了不辱父命，继承孔子伟业，司马迁便坚定地肩负起效法孔子著《春秋》而写《史记》的崇高使命。对于《春秋》，司马迁不单单看作是一部“史”书，而视之为“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旨意高远、内容丰富的纲领性的文化经典。他的《太史公书》亦绝非一般“记言”“记行”的史官之举措，而是在“紬史记石室金匱之书”的基础上，要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而这“一家之言”，不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补六艺之不足，还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其内容的丰富和宏伟，较之《春秋》，意欲要突破和超越是非常明显的。

司马迁以孔子之后的文化领袖自许，决心写出胜过《春秋》的《史记》，并未狂言欺世。论《史记》的成就，不管从中国历史长期已行的实践性，或从集文化之大成的广博性和从领风气之先的进步性哪一个方面而言，较其前人，都是后来居上之佼佼者。如以实践而论，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行之有效的外儒内法的政体，并非是孔子思想的体现，实则以司马迁崇儒而不弃法的思想所构建；上层文化领域内百家竞流的实际，也非孔子一家的独行，而是司马迁“整齐百家”的再现。论其文化知识面的广博，李长之先生誉司马迁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巨著《史记》当然也就是“百科全书”类的宝藏了。《史记》除了囊括孔子所致力于诗、书、礼、乐之外，又融汇百家学说于一炉，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民族、民俗，特别还

有天文、地理、医学、科技等；而且并非停留于孔子“述而不作”的整理介绍阶段，力求作到“通古今之变”的论述，让人们“原始察终”，充分认识其历史源流的发展变化。论其文化思想的进步性，且不必详列对各科文化的卓识远见，仅就政治上不提倡“克己复礼”，而在总结“承敝通变”的基础上大力颂扬革新进步；经济上不重本抑末，而提倡创造财富发展商品经济；在国家的统一上，不囿于“华夷之分”的狭隘圈子，而提倡华夏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的诸民族大一统的崇高思想；对外不是闭关自守，自我独尊，而是竭力介绍域外物产，让人放眼更广阔的天地。诸如这些思想认识，不仅在两千多年以前是十分杰出的、领先的，即如在两千年以后的今天，亦是闪闪发光，仍具有相当生命力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司马迁是位当之无愧的华夏文化巨人，其文化思想精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真正代表。

令人欣慰的是，丛书的组织者和编著者，充分认识到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及其崇高地位，不再囿于史学、文学范围的研究，推而广之，努力开拓新的领域，着眼于多层面全方位的探讨。如此全方位深化司马迁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尤其富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充分探讨《史记》的丰富意蕴，总结两千多年的人事盛衰、存亡、成败、得失、挫折的宝贵经验，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借鉴作用；科学评论司马迁的崇高精神及对文化的巨大贡献，让人们为有如此震古烁今的文化巨人而自豪，本身就具有产生爱国主义情操的强烈感染力；重视阐明司马迁对华夏文化的丰功伟绩及进步思想，既能使人们正确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也非常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丛书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所收集的各家的论著，不强求观点的一致，这也体现了司马迁的治学精神。学术研究要发展，不可能没有争议，更何况对司马迁展开全方位的研究，确属开创性的事业，更需要各抒己见，互相争鸣。

司马迁竭尽毕生精力所撰写的《史记》，总结了中华二千多年的古代文明，是第一部集华夏文化大成的百科全书，其博大精深的内容，需要集中更多人的智慧，花更多精力来不断研究。因此，我热切希望更多的学者和海内外热爱华夏文化的仁人志士，投身于司马迁的研究，为弘扬华夏文化做出贡献，也希望以此为契机，继续前进，把陕西逐步建设成司马迁研究基地。

1994年国庆前夕于西安

目 录

绪 论	[1]
1. 经学兴起的原因	[1]
2. 司马迁时代的今古文经学	[10]
3. 《史记》与六经灵魂	[23]
一 《春秋》与《史记》(上)	[33]
1. 司马迁述董氏公羊义	[34]
2. 司马迁论孔子获麟	[38]
3. 司马迁论《春秋》一王之法	[41]
4. 司马迁论《春秋》正道德治精神	[50]
5. 司马迁论《春秋》一统思想	[57]
6. 公羊春秋的纲领地位	[69]
7. 壮丽的人生	[72]
二 《春秋》与《史记》(下)	[75]
1. 《史记》述《左传》义	[76]

2. 《左传》的民本精神 [83]
3. 《左传》中的史官言行风范 [89]
4. 《谷梁传》与《史记》 [92]

三 《周易》与《史记》 [95]

1. 司马迁的《易》学渊源 [95]
2. 《史记》中的《易》说 [98]
3. 《易传》与《史记》的宇宙观
..... [102]
4. 《易传》与《史记》的通变论
..... [106]
5. 《易传》与《史记》的政治伦理观
..... [113]
6. 《易传》与《史记》的人生观
..... [117]
7. 《易传》与《史记》的学术观
..... [123]

四 《尚书》与《史记》 [127]

1. 《史记》所引《尚书》篇目 [129]
2. 《史记》中的今文《尚书》说
..... [133]
3. 《史记》中的古文《尚书》说
..... [140]
4. 《史记》与《书序》 [144]
5. 《尧典》与《史记》 [158]

6. 《洪范》与《史记》	[171]
7. 《尚书》的政治观	[174]

五 《诗经》与《史记》	[179]
1. 《史记》采用《鲁诗》说	[180]
2. 《史记》的《诗》学文化观	[193]
3. 《诗》《骚》与《史记》美学	[198]

六 “三礼”与《史记》	[215]
1. 司马迁所见到的“三礼”读本	[216]
2. 《史记》中的“三礼”材料	[218]
3. 《史记》中的今古文礼说	[221]
4. 《史记》中的《礼书》与《乐书》	[225]
5. 司马迁与礼学精神	[229]

七 《史记》“厥协六经异传”	[236]
1. 《史记》“考信于六艺”	[237]
2. 《史记》从六经异传取义	[243]
3. 取镛经义而自铸伟辞	[248]

八 《史记》今古文经说对后世的影响	[253]
-------------------------	---------

1. 借说经宣传政治观点 [254]

2. 学者经学之争 [263]

后 记 [271]

绪论

《史记》与今古文经学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这种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史记》的许多材料以及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评价来源于儒家经典，而且表现在经学深刻地影响到司马迁的宇宙观、历史观、政治观、文化观和人生观，影响到《史记》的整体构思。前人论《史记》与今古文经学，其侧重点在经学而不在《史记》，即是以《史记》作为今古文经学论争的依据。本书的侧重点恰恰相反，意在从经学角度，揭示《史记》的文化学术渊源。

1. 经学兴起的原因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接受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

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①，从此儒学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干，影响中国达两千年之久。

那么，经学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汉武帝为什么要表彰儒术？对此，许多论著作了探讨。论者们认为，汉武帝提倡经学，是要找到一种积极有为的学说来代替汉初黄老无为而治的理论，是要找到一种完美的解决君臣民关系的方法，是要找到一种适合于封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意识形态。这些说法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根据秦汉之际普遍的社会心理，我认为经学之所以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兴起，至少还应该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六经代表着上古三代的王道文化传统，代表着一种理想的政治，这在秦汉之际有着强烈的感召力量；二是在战国后期儒学与阴阳五行学派以及神仙方术的合流，是促使汉武帝下决心以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从春秋到战国这几百年期间，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痛苦的年代，中国大地上，到处燃起熊熊战火，到处流淌着淋漓的鲜血。社会充满了暴力、强权和欺诈，混乱代替了秩序。两百年后，刘向校《战国策》，在序言中仍然对战国社会流露出一定程度的恐惧情绪：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仿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

^①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之年，一说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

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①

这是刘向对战国时代的看法，它也能代表战国时期一部分人士对现实社会的观点。现实既然是如此令人痛心疾首，那么人们自然而然地向往和平、安定、美好的社会，追求理想的政治境界。人高于动物之处，就在于他即使处在最困难的环境之中，也从不熄灭心中的理想之火。接着而来的问题是：这个理想的政治模式是什么？当时没有外界思想传入，要追求理想政治，或者依靠思想家的智慧去探索去设计，或者从古代社会寻求理想政治的踪迹，借助于述古而阐发自己的政治理想。法家选择了前者，而儒、墨、道则选择了后者。如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西周政治为理想楷模；道家希望返回到上古时代，墨家则借夏禹立论。正是在这种以古代为政治黄金时代的观念指导之下，古代政治的价值被挖掘出来，它不是被安放在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室里供后人赏玩，而是镶在希望之塔的顶端，让它照亮后人的前进道路。这样也就形成了今不如昔的复古倒退的文化观，形成了托古改制的独特的改革政治的思路。为什么不是

^① 《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墨、道而是儒家的政治理想获得了后代社会的认同？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偶然而而是出于必然。从文化渊源方面来说，儒学倡导的仁爱精神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人道主义，它比其他学派具有更深的文化根基，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从民生需求来说，儒家提倡的德治主张，与普通人民要求具备衣食住行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是一致的。此外，儒家倡导的君臣父子纲常伦理、夷夏之辨、礼乐教化和天下一统等主张，也反映了人们对于安定与秩序的愿望。由于儒学本身具备了这些有利条件，因而尽管在动乱岁月，儒学被视为迂远疏阔不切时用，但它却是适应于封建治世的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在中国取得统治思想的地位是一件势所必然的事，剩下的只是这一天到来的迟早问题。六经原来只是几部古籍，儒家通过传授六经而使之成为自己的专利^①。从今天看来，六艺分属不同的学科：《书》为政令文诰，属官方文书；《易》为术数，《诗》《乐》为艺术，《礼》为伦理，《春秋》为历史科学。但儒家认为它们都是言治之书，是上古三代王道政治的记录。《史记·滑稽列传》说：“孔子作史，修春秋，左丘明作国语，以正其世，匡其不逮。”又云：“孔子作春秋，而左丘明为之解，其高才天授自不可磨夺。”《汉书·艺文志》也说：“孔子作春秋，而左丘明为之解，其高才天授自不可磨夺。”《汉书·儒林传》也说：“孔子作春秋，而左丘明为之解，其高才天授自不可磨夺。”

① 《庄子·天下》说六经为“古之道术”，战国诸子多称引六经。

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

这表明儒家认为六艺是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去说明治道，都可以作为古代遗留下来的政治教科书来阅读。由于六艺记载的是上古三代政治，因而对于后人来说，它已经完成了由政治到文化的转化，即是说它代表了王道文化传统。它的价值就在于作为一种理想政治的范本，对现实政治起着指导作用。因此，儒家倡导的经学在西汉兴起，不仅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也符合社会各阶层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符合人民对于明君仁政的美好愿望。从春秋末年开，人们就盼望着“拨乱世而反诸正”，这个“正”，也就是六经所记载的上古三代王道政治局面。直到汉代，经学才被确立为封建统治思想，王道政治才被作为封建政治的奋斗目标来追求。

儒学兴起的另一个原因是儒学与阴阳学说、神仙方术的合流，适应了秦汉之际统治阶级受命改制的需要。由于儒学不适用于动乱社会，因而尽管它比其他学派具有更为深厚的文化根基和其他有利条件，但是仍然受到各国君主的冷落，在战国时代走红的是有利于诸侯兼并争夺运亡为存的法家、兵家和纵横家。儒家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进行自身改造与调整，调整的方式是吸收其他学说，以迎合统治者的需求。《韩非子·显学》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儒学这种自身分化正显示了它向多方面发展的趋势。从秦汉之际政治情形与意识形态发展状况来看，对儒学兴起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它与阴阳神仙方术的合流。顾颉刚先生将秦汉之际的儒家学者称为“儒生方士”，这是一种非常准确的称谓。儒学与阴阳学说的合流表现在

它吸收了阴阳五行学派的五德终始说，并由此受到启示，提出了三统循环论。三统循环论形成的确切年代不可详考，《礼记·檀弓上》就有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的记载，可能在战国后期就已经形成。按照这个理论，天人宇宙按五德终始三统循环的模式运行变化，每个王朝都会得到五德中的一德和三统中的一统，而易姓受命而王，应该改正朔，易服色，变度制，定官名，制礼作乐，并在泰山上举行封禅大典，从此与前代王朝区分开来。最先将儒生方士受命改制说付诸实施的是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在秦始皇受命改制活动中，儒生方士应该是积极参与者。儒生也参加了秦始皇封禅大典，只不过表现得十分迂腐。《史记·封禅书》载：“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菹稭，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是绌儒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儒生本来希望找到政治出路，但是当朝廷真正需要他们效力时候，却又显得那样笨拙。儒学与神仙方术合流表现在儒生参与了燕齐方士寻找仙人仙药的活动。《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卢生说秦始皇所居宫不要让人知道，以便于找到不死之药。此后侯生、卢生又认为秦始皇刚戾自用贪于权势，不值得为他求仙药，因此结伴逃亡而去。秦始皇闻之大怒，将咸阳460名儒